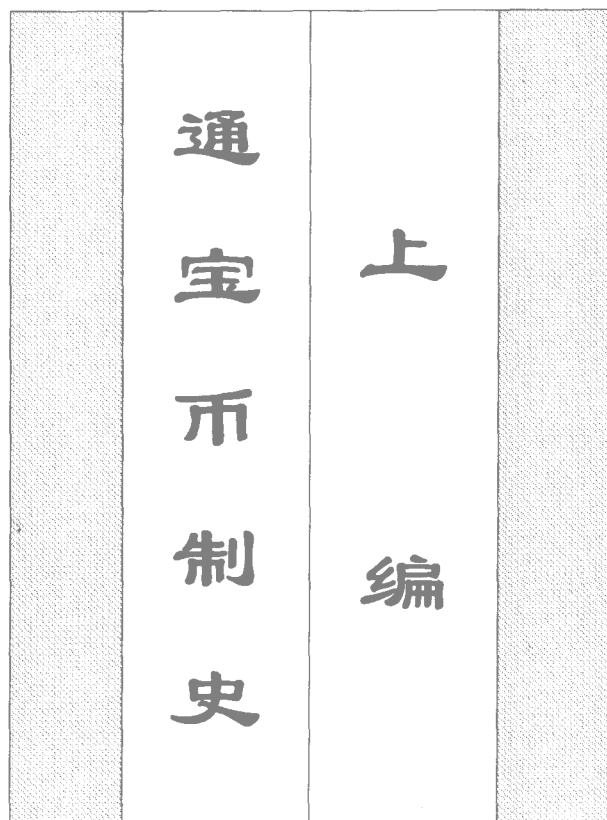




通宝币制的历史渊源

第一章

唐代创立的通宝币制，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也是古代社会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结晶。它的出现，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生长在上古、中古时代货币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上的一株奇葩。因此，要全面了解通宝币制，首先必须透彻地了解它赖以产生的历史渊源。

分而言之，通宝币制的渊源，可展开为这样几个层次的问题，即货币的起源、铜铸货币的形成、方孔圆钱的确立乃至半两币制与五铢币制的历史遗产。

透过这些问题的概略评述，我们将依次跨越中国货币史上的货币孕育时代、贝币时代、多元铜铸币时代、半两时代和五铢时代，去追溯中国古代货币从萌发到形成的遥远历程；寻觅铜铸货币在历史上的最初踪迹；探求方孔圆钱形制的文化内涵和定型因果；概览从半两币制到五铢时代的千年旅途中币制、币政和币论的种种建树，从而为通宝币制的横空出世，勾勒出一幅概略的历史脉络图景。

第一节 从货币起源到多元铜铸币时代

一、中国货币起源研究的意义

货币是人类文化的创造物，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形成的。当遥远的上古出现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以后，货币便降临到人间，这是世界各地文化概莫能外的共同规律。

中国上古时代货币的起源，不仅起步很早，而且拥有古老的传说和较为丰富的地下出土实物及古文字资料。拨开历史岁月的迷雾，重建中国货币史的童年时代，具有追根溯源的理论意义，这将有助于阐发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发展规律，揭示古代食货经济传统，诠释秦汉至隋唐以来中国历代货币制度的渊源和发展依据。而且，这也是在世界货币文化谱系中，为中国货币文化确定座标系的关键性工作之一。

因此，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货币史学科的奠基，史家对这个课题一直投予关注的目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尤其是 50 年代以来，学者们充分利用考古出土资料，继承

历代钱币学研究的精华，对中国上古货币起源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学术见解，有力地推动了这个课题的纵深发展。本书正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来追述古代货币的早期历程，说明其与通宝币制间的源流关系。

二、中国上古货币起源的条件

经典作家认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中的必然产物。”^①“货币形态或是附着于最重要的外来交换品，或是附着于家畜一样的使用对象，那是内部可以让渡的财产的主要要素。”^②

在我国上古历史上，交换的经常化并发展到一定规模，大约是在神农时期。《易经·系辞》载：

“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这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即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当时农业与畜牧业开始分离，产品日渐增多。各部落之间乃至氏族和生产者之间有了经常的交换。《淮南子·齐俗训》载：

“故尧之治天下也……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

可见，直到原始社会末期，交换的主要形式还处在实物交换水平上。

从考古材料看，新石器晚期大汶口等文化类型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猪头骨，这表明猪已是人们的私有财产，并成为交换中的等价物。^③古文献的记载正好也印证了这一点，如《礼记·曲礼下》载：

“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

上述部落、氏族和生产者之间的物物交换，和交换中等价物的形成，为货币的出现准备了最初的条件。

三、夏、商和两周的贝币

(一)夏朝的贝币

根据文献传说和出土实物，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币，目前可以确定的年代为夏朝。所以，货币是伴随中国历史上的文明时代一道诞生的。

先来看汉代文献的记载：

《史记·平准书》：“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

《盐铁论·错币》：“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用金钱刀布。”

《太玄》：“古者宝龟而货贝，后世君子易之以金币，国家以通，万民以赖。”

《说文解字》：“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泉。”

剔除汉代学者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之后，《史记》、《盐铁论》等古籍关于夏代用贝币的传说，已经被夏代文化考古所证实。我们知道，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我国四千年来文明

发展的基础。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的发掘显示，夏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④

在农业方面，生产工具有石镰、石铲、石刀、骨耜等出土，夏人使用这些工具平治水土，发展农业。在青铜器方面，已出土有青铜刀、锥、镞、铃、凿、镞、戈和爵等，同时还发现有铸铜遗址，铸铜工艺已有一定规模和水平，表明自夏朝开始历史已进入青铜时代。其他手工业如制陶、纺织、玉器骨器加工、造车、酿酒等行业也有相当成就。在登封王城岗遗址又发现了小型城堡的夯土墙基。夏朝这种社会生产力水准和私有制发展程度，无疑具备了货币流通的社会经济基础。

目前，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 1—2 枚穿孔海贝，可以认定是夏代的货币。^⑤海贝是暖海中所生长的一种贝类，产地远在印度洋、南海沿岸和香港、海南岛沿海，对于北方中原的夏族来说，它是一种外来交换品或贡献品，是充作货币的良好材料。除天然贝外，偃师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骨贝、石贝。由于夏代文字目前尚未真正发现，从出土文字角度证明夏代贝币的使用，尚俟诸来日。

（二）商代的贝币

商代贝的使用更加普遍。殉葬用贝现象，已成为一种社会习俗。从历年安阳发掘情况看，百分之五十的墓葬中都用贝殉葬。商代贵族的墓中有大量殉贝，1976 年，妇好墓中一次出土贝币 7000 多枚。^⑥平民墓中也有一些殉贝，最少的为 1—2 枚。当时可能还出现以赚取贝为职业的商贾之民，因为在安阳发现的一些商代墓葬中，既没有许多青铜礼器殉葬，也没有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但却有数十或数百枚贝殉葬，这种身份，很可能是携带贝币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贩。^⑦

随着贝的货币职能的扩大，王室贵族向臣下的赏赐，也逐渐由以往单纯用实物转变为兼用货贝。在武丁以后的甲骨卜辞中，有关于“赏贝”、“赐贝”的记录。例如：

庚戌〔卜〕……，贞易（赐）多女又贝一朋。^⑧

……征不死，易（赐）贝二朋？一月。^⑨

商代金文中也有赐贝的记载，如：

丁亥，夙赏（赏）又（右）正夙赏贝，在穆，朋二百，夙赏扬夙赏，用作母己鬲。^⑩

丙午，王赏成嗣子贝廿朋。……^⑪

庚申，王在嵩，王格宰橐从，赐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在六月。^⑫

己巳，卿事锡小子鬲贝二百，用作父丁鬲。^⑬

在文献方面，《尚书·盘庚》记有商王盘庚的训辞。他指责臣僚只知道“具乃贝玉”，又警告大臣“无总于货宝。”反映了商代贵族在商业交换逐渐发达的情况下追逐贝货的风气，也有力证明贝货在商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殷墟出土的实物贝币，从其穿孔、加工程度可分为三个阶段：小孔式，孔径不大于 0.2cm；大孔式，孔径 0.3—0.8cm；磨背式为第三阶段，体积大大缩小，重量比大孔式贝减轻十分之一左右。据研究，至迟在商代前期货贝已经进入第二阶段，而商后期出现的磨背式贝币，使用更为轻便。这是贝作为实物货币的高级阶段。^⑭

(三)两周之贝币

两周时期是奴隶社会高度发达阶段，贝币在货币系列中，仍扮演着主要角色，是两周的本位货币。周代墓葬中出土的贝币较多，仅扶风地区发掘的 103 座墓葬中，就出土贝币 1400 余枚。^⑮ 陕西沔西 182 座西周墓中，殉贝就达千枚以上。^⑯ 商周金文屡见赐贝的记录，留下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从而为我们了解西周贝币的购买力，提供了条件。例如周成王时，一件铜簋价格为十四朋贝。八十朋贝可购买土地十田，折合为一贝币可购土地 0.75 市亩。周共王时，一匹好马，值五十朋贝，一个奴隶的价格是二十朋贝。^⑰

进入东周之后，我国早期的金属铸币已广泛铸造和使用，但实物贝币在流通领域仍是很重要的货币种类。东周贝币在种类、数量和分布地区上，比商和西周多而广泛。据对《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刊物发表的出土文物报告的粗略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东周墓葬遗址中，出土海贝达 6878 枚，蚌贝 319 枚，骨贝 797 枚。^⑱ 出土地域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

东周金属铸币出现后，并未能迅速取代贝币，这是因为铜原料受限制，贝币可补充货币流通的不足，又可充当低值货币与铸币相辅而行。而且，长期使用贝币的传统也起到一定的历史惯性作用。在诸侯割据状态下，海贝又能够充当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中的通用币角色。约至战国中晚期，贝币渐趋衰落。及秦统一，贝币才正式在中原各地货币舞台上消失。

综上所述，贝币的出现，揭开了中国上古货币的序幕；贝币的流行贯穿了三代和东周的历史；贝币开创的古币职能乃至用货币殉葬的文化习俗，均为后世通宝时代所继承发展。

四、中国早期的铜铸币

中国古代金属铸币的起源，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据《管子·山权数》：“汤以庄山之金铸币”，“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夏代铸币的传说是否可信？夏文化考古证明，夏代确已进入青铜时代，就青铜冶炼水平而言，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在技术上已具备了可能性，但迄今尚缺乏出土实物的证据，因而夏代有无金属铸币的问题，尚俟考古新发现来解答，不宜武断地否定。

目前拥有科学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上古铸币是商代后期的铜铸贝币。1953 年，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出土三件铜铸贝。据发掘者报告：“铜贝三件，墓十四出土一件，墓三一二出土两件。出土铜贝型式相同，系仿海贝铸制的。墓十四出土的一件，长 1.5，最宽 1.2 厘米。墓三一二出土的两件，大小相同，长 1.7，最宽 1.3 厘米。”^⑲ 1961 至 1977 年，在安阳殷墟西区 620 墓中亦出土铜贝两件。^⑳ 1971 年在山西保德县林遮峪村商代墓中，出土 109 枚铜贝和 112 枚海贝。^㉑

依照经典作家的意见：“货币的铸造形式，是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功能发生的。”^㉒ 这些铜仿贝是在商代冶炼青铜工艺技术高度发展条件下，适应日益发达的商业交换需要而产生的。因为外来的天然海贝，不仅来源有限，而且易损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贝

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因而仿贝形式的铸币应运而生。

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找到与铜铸贝币有关的文字，即“𠄎”和“𠄎”字。此字从贝从𠄎，可译读为𠄎。^②𠄎，是先秦时期的金属重量单位。𠄎字证明商代铜铸贝币，是以𠄎作为重量单位使用的，这完全符合早期铸币币材重量单位与名称价值相同的规律。

西周的铸贝，今已有零星的出土。在西周的金文器铭中，亦留下铜贝使用的记录，如《稽卣铭》：“易（赐）贝三十𠄎。”天然贝是以朋为计算单位，𠄎为金属单位，所以这里的“赐贝”是铜铸贝币。西周器铭中还多次提到金属“𠄎”，也以𠄎为计量单位，郭沫若认为“大抵乃货贝字”，^③此也是指铜铸贝。

50年代以来，又有商代后期的青铜铲形工具钱、铸在黄河中游地区出土，如安阳商代墓葬和安阳殷墟分别出土铜铲，后者通长 22.3cm，形状与后来这些地区出现的空首布相似。我们认为，它一方面是铲形农具，另一方面也开始执行等价物作用，逐渐发展为金属实物货币，即所谓“原始布”。

此外，西周考古中又发现青铜饼和青铜块在相应地层或墓葬中出土。如 1970 年和 1981 年，在周原法门乡召陈村的西周灰坑中，出土两件紫铜圆饼，分别重 4560 克、5000 克。^④青铜块则以苏南地区的为典型，如 1975 年在金坛县整墩西周墓中出土 230 块青铜块。^⑤这些青铜饼、块很可能是西周时当地流通的金属称量货币。

五、春秋战国时期铜铸币的历史地位

春秋战国五百年间，中国古代铜铸货币种类繁多，形制歧出，令人目不暇接。这既是当时社会急剧变革，经济飞速发展的产物；也是周王室衰落，各诸侯国割据局面的反映。各种钱币的始铸年代，迄今无准确断代证据，许多研究者意见不一。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大体而论，约在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

（一）铜贝

东周时代的铜贝，大致可分两类，即无文铜贝和模铸文字的蚁鼻钱。据统计，五十年代以来，考古专业刊物发表资料中，属于东周出土的铜贝数量达 27341 枚。^⑥（有些报告没有介绍具体数字，则无法计入。）无文铜贝，多是仿背磨式海贝的形状：面凸起，有模铸的贝齿，底内凹。主要流行区域有三晋、齐、燕地区。如侯马市上马村 M13，是一座七鼎墓，出土铜贝 1600 枚，包金贝 32 枚，时代为春秋早中期。并在侯马牛村古城遗址内发现大量的铸铜贝的铸范。从遗址分期看，铸贝活动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⑦齐国初铸刀化时，铜贝同时也在交换市场上流通。如临淄齐故城于家村春秋墓出土无文铜贝数枚。一枚齐法化大约相当无文铜贝四十枚。1981 年，曲阜鲁国故城林前村春秋墓，出土 588 枚无文铜贝，外有碎片 200 枚。在林前村被铺路扰乱的墓土中，发现 8 枚包金铜贝的残片。^⑧在燕北的东胡地区，也出土过无文铜贝。^⑨

蚁鼻钱，是楚境流行的铜铸币。目前出土的蚁鼻钱，均为战国时代的窖藏，个别出于墓葬。如湖南常德德山镇 M47、M50 等，^⑩尚无早于春秋的证据。蚁鼻钱出土范围很广，东至黄海之滨，西至咸阳、南到长沙、北至曲阜均有发现。其中曲阜董大城村，一次出土

15978 枚。^②是目前已知出土最多的一处。蚁鼻钱币的铸文有君、忻、金、贝等十种字样。战国中期流行“𠄎”、“𠄎”，晚期统一于“𠄎”。

（二）布币

春秋时主要形态为空首布，流通于黄河中游地区，即周、郑、晋、卫等国。进入战国时期，演变为平首布，再变为方足布、尖足布以至圆足布，其流通区域扩大至燕国和秦国，尤其是三晋各国的重要城邑，都铸行布币。流通范围北至辽宁，南抵河南，东至山东西界，西到陕西。根据目前考古发掘资料判定，年代最早的布币，是山西侯马的晋国城址附近所发现的 12 枚大型耸肩尖足空首布，出土于春秋晚期地层。^③出土布币数量最多的，是在山西阳高县天桥村发现的一批战国窖藏布币，总重达 102 公斤，计 13000 枚。这些布币钱文所记地名近百处，大体确知的均属三晋地区。^④

（三）刀币

春秋时期刀币铸行区域在齐地。战国时期，刀币流通扩大，成为齐、燕、赵广大地区的共同铸币形式。齐国早期刀币有：齐造邦、齐之法化，即墨之法化，安易之法化数种。至战国，主要流行齐法化刀。在燕国则流行明刀。燕赵原为布币区，铸行刀币后形成刀布并行区域。文献中屡屡“刀布”并提，考古出土实物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北京呼家楼出土的战国窖藏钱币 3800 余枚，其中明刀占 2800 余枚，布币 992 枚。^⑤燕下都、丰宁等地亦发现布刀共存现象。^⑥

除以上三大币系外，还有圜钱体系，因其开创了中国后世方孔圆钱的基本型制，故将在下面专作研讨。

第二节 圜钱与方孔圜钱形制的创发

在先秦的各种铜铸币之中，圜钱的地位至关重要，因为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方孔圆钱的铜币形制，就是渊源于圜钱的。那么，圜钱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外圆内方形制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问题，学术界迄今尚无确凿的结论和一致的看法。

一、关于圜钱的铸行年代

据汉代班固的追溯性记载，圜钱的历史开始于西周初年。《汉书·食货志》：“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太公退，又行于齐”。据此，西周初年太公已为周朝制定函方圜钱，并把这种币制推行到齐地。班固记载是否可信？圜钱究系何物？历代钱币学家搜集了大量传世实物。王献唐依据古文献和古文字学考证，对班固记载进行详细考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周人以居西土，西方产玉，初即用为货币，殷商一朝，且早为圆形，行于周土，并及殷方。殷亡以后，太公改铸铜环，玉环渐退，但用为器饰宝藏，不为钱币。太公退，又行于东齐，齐不产玉，无玉环币制，系西法东来。”因此他认为，“太公就西土旧币，酌改铜质，经此一改，遂永为环币之祖。数千年来，通行社会，方孔圆形之铜钱，皆

太公遗制也。”太公成为方孔环形铜币的创始人。就圆钱与刀币关系论，则“刀制尚出其后者也。”^{③④}

但也有些史学家对班固的记载持怀疑态度。如郑家相认为“圆金者，圆形圆孔之化币也，创自周季（周末），盖当时感布化行用不便”。“凡今日所见之圆金，无一不由布化所递嬗。圆金亦布化与钱间之过渡制作也。”^⑤

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考古事业的发展，史学界对圆钱有了新的认识。首先，从西周遗址墓葬中，迄今未发现铜铸圆钱，姜齐早期的铸币，迄今也仅发现无文铜贝，和可能是姜齐建国时期所铸的齐建邦刀。以上两点，大体证明圆钱的真实铸行年代晚于西周。

目前传世和科学考古发掘记录的先秦圆钱，主要有秦地出土的一两圆钱、魏地出土的共、垣字圆孔圆钱和齐地臚化圆币。

在否定了圆钱出现于周的说法后，东周时代这三地出现的圆钱之间关系如何？三地是分别独立形成环币或由一个发源中心传播各地的呢？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这个问题的探索，只能依靠考古分析了。因为绝对年代证据阙如和科学发掘材料欠丰富，尽管不少史著和研究者提出一家之言，但均停留在假说水平上。

秦地一两圆钱的重量有 15.56 克、14.70 克、13.9 克、10.35 克，最轻的一枚 8.76 克。平均重量较重，造型古朴，钱文字体接近西周金文，“两”字一般无上面一横，个别的虽有上面一横划，也很短，中间两个人字，上部竖笔很长，十字作十或一。它出现较早，上限在春秋晚期，下限至惠文王二年（前 336 年）之前^⑥。共字、垣字圆钱，“共”、“垣”都是地名，共在今河南辉县，春秋时属于卫国，战国入于魏国。垣地望，在今山西垣曲县西，战国时魏邑。垣钱重量分为 9.72 克、10 克、10.40 克，共字钱重量为 9 克。^⑦闻喜出土的共币重 14—18 克。^⑧有人认为魏地圆币在先，秦圆币是受魏币影响而产生的。是说一个重要的根据，就是把惠文王二年初行钱定为行一两圆钱。本世纪 80 年代四川秦墓中出土简牍和半两钱证明，惠文王所行钱为半两方孔钱。这样，一两圆钱的历史年代大大提前，秦圆钱与魏圆钱的年代便同时了，两者孰先孰后，尚难遽定。

在齐地，亦出土不少先秦方孔圆钱。如 1960 年，济南五里牌坊出土一瓮古币，其中圆钱 60 枚，含臚六化、臚四化、臚化、一化四种。1968 年青岛市郊出土臚六化一件、臚四化二件。历年出土的地区，大抵已遍及齐国故土的各个县市。^⑨在燕地，出土有三种方孔圆钱，出土地区分布在辽宁、吉林、朝鲜北部，大抵相当于燕昭王、惠王新扩的辽西辽东郡之内。^⑩齐地方孔圆钱的出土规律，是多与齐法化刀币伴随出土，而未见与齐建邦刀伴出的情况。

从齐法化形制铸造工艺、出土数量、钱文书体等各种因素综合判断，一般认为属战国中期以来的齐国主币。据此，则齐国臚化圆钱的出现年代，大约在战国中期，并且很难再进一步限定于具体年代，因之，在有准确系年的出土材料发现之前，就无法与秦方孔圆钱的出现准确校定先后了。

有人出于一元中心传播论的思维习惯，欲将齐、燕方孔圆钱视为秦方孔半两钱的传播结果，人为地将齐方孔圆钱问世的年代推迟，认为是战国末期秦政治、军事扩张的结果。

但在齐钱断代上并无有力的证据，所以至今只能停留在假说上。从三地圆钱的各自地位看，差异也很明显。在秦国是作为主体货币形式的，而在魏齐则是作为辅币形式的。至此，我们能够初步作出的回答是，圆钱的出现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期以后。如果能打破文化创造一元传播论的思维定势，按照铸币必然趋于圆形化的规律，那么，似乎在秦魏与齐地分别独立形成也是完全可能的。

二、造型由来的推断

圆形钱造型的由来，经历史家的探讨，目前大体已形成共识，基本都同意圆钱造型起源于玉璧形制说。古代玉器有环形，为一种玉饰品。《礼记·玉藻》：“孔子佩象环五寸”。《世本》：“舜时，西王母献白玉环及玦。”环之功用，初以饰身，继亦用为陈设品，又或用为聘享，兼及其他器用。《尔雅》释器云：“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铜铸圆钱出现后，古人仍沿袭称玉的传统，把钱身叫做肉，把孔叫做好，这不啻为圆钱渊源于玉璧的有力证据。

那么，环与圆两字是否相通？《说文》释璧：“曰瑞玉，圆也。”《御览》卷八百二引圆作环，可证两者音义并通，并证明璧也是环。环又与瑗音义并同，本一字异体。《汉书·五行志》：“宫门铜瑗。”颜注：“读与环同。”所以，上古之时璧可称环，环可书瑗。因此，圆币的圆的本义，是指玉璧。^④

玉器是怎样演化成货币的呢？玉作为珍贵饰品，因为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喜好，久而久之，就充当了交换中的媒介物，然后进而演变成成为货币。《管子·国蓄》说：“先王以珠，玉为上市。”商代墓葬中，殉玉是常制，出土的玉器十分丰富。周代器铭中也记载了玉器的价值。如《裘卫盃铭》记载矩白（伯）庶人，以十块田交换裘卫的值八十朋贝的玉器。西周的玉是以珏为计算单位的，在交换过程中，还要折合成贝朋来计算。

玉璧作为货币在交换使用中，也必然受到青铜铸币工艺的影响，于是，逐渐出现以青铜铸成的环形货币，“壹其轻重，定其价格，专以交易。即圆形货币所由仿也。”所以，早期的圆币形态上还较多地保留有玉璧的特征。如垣字、共字币、珠重一两币其好皆小，仅及肉半，“殆仿璧形为之，所谓肉倍好者也。推其初形，皆出于璧。”而且初象真器铸造，大小亦与真器接近，故较厚重。

上述由玉璧转变为圆币的年代，从考古发掘的各种迹象综合推断，其上限当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

考古发现证明，玉器作为远古社会人类文化的重要创造物，约出现在旧石器时期。在我国各地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分布十分普遍，从黄河上游中下游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辽河、红河流域到珠江流域，都能寻觅到它的踪迹。秦地作为惟一的圆钱主币区，其创设圆钱的历史可能性和优势，在于它与西部玉的产地接壤，玉文化较为发达，这为秦国效法玉璧形态铸币，提供了条件。不过三代以来，各地大型墓葬中的考古发现，也同样表明，玉器在上古中国各个地区都流行于上层社会中。也就是说，它在西周各地区，都同样具有作为实物货币使用的历史传统。明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推断，不论秦地、魏地、

齐地，其实都拥有独立创立圆币的历史基础和条件，未必需要来自外铄的因素。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各种货币的演变系列中，圆形化趋势是古币形态变迁进化的共同规律。从古代希腊、罗马货币到西欧金银诸币，多呈圆形，这是因为各种几何形体中，圆形币圆边无棱，不易磨损，便于取放、携带和储存，因而对其他币形来说，具有无法相比的优越性。中国古代圆币的形成，渊源于发达的璧文化，最后终能在各种形态的铸币中脱颖而出，奠定了两千多年铜币形制，体现了人类货币文化发展概莫能外的法则。

三、方孔圆钱的出现

圆钱的圆形圆孔造型，可以看作是其形制的原生形态；而圆形方孔的出现，则无疑是古代圆形钱币的高级形态了。

那么，方孔圆钱率先在哪个地区问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也同样隐藏在历史深处。^{④6}1979年，四川青川秦墓 M50 出土半两钱 7枚。^{④7}M50 埋葬的年代，根据随葬的木牍文判断，不晚于秦昭王元年（前 306 年）。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惠文王二年（前 336 年）“初行钱”。关于钱币铸行，史书别无记载。所谓“初行钱”，可能铸行的即半两钱。

从《史记·秦本纪》所记秦国史实看，一项新制度往往先推行若干年，然后才以法令形式固定下来，这已形成秦国政制传统。据此，则半两钱的问世的年代，又可提前到惠文王二年之前了。惠文王之前是秦孝公，孝公用商鞅变法，多所改革，钱制的改革也有可能，因此完全有理由提出一个假设：即孝公变法始行半两钱。时间在公元前 356——前 350 年。

以上对秦币的探讨，说明秦圆钱经历了由圆孔向方孔的递嬗，这个变迁序列似乎证明：方孔是圆孔的后期形态，或进化形态。但奇怪的是齐地、魏地的圆钱都没有表现出这种进化序列，故尔有学者提出传播论的思路来解释这个史实的矛盾。就是说魏地接受了早期传播，故行圆孔钱；齐地接受传播晚，故行方孔钱。但是说矛盾很多，比如，魏秦为毗邻之国，为何未接受晚期传播？事实可能比这种思路复杂得多。

四、方孔圆钱的文化背景

方孔的改革，曾经有从工艺技术因素推究的，也有从意识形态观念因素探讨的。比较起来，后者更为重要。晋人鲁褒《钱神论》云：

“昔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教民农桑，以货帛为本，上智先学变通之，乃掘铜山，俯视图，铸而为钱，故使内方象地，外圆象天，钱之为体，有乾有坤。”

鲁褒的说法，给后人提供了解释方孔之谜的历史线索。循此，王献唐曾注意到战国末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和《大戴礼记》所记载的天圆地方思想。^{④8}据笔者所了解，先秦典籍记载表明，从周代以来，就流行着一种“盖天说”，以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据《大戴礼记·天圆》所说，在孔子时，也已认为“天道曰圆，地道曰方”，且把天圆地方说提高到天地之道的地位上，加以宣扬。战国中期宋玉的《大言赋》中亦有此说：“方地为车、圆天为盖。”屈原在《天问》中写道：

“幹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隅隈，意指天圆故多隈（弯曲），地方故多隅（角落）。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圆道篇》认为：“天道圆，地道方……”据说曾参对此也有怀疑：“诚为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掩）也”。

以上说明，天圆地方确实是周代流行的天地观念。这种流行的天地观念，怎样渗透到作为经济媒介的货币上的呢？这应该追溯到中国古文化中观物取象的思维传统，这种传统成为连结古代宇宙观和方孔圆钱形制的中介。

在上古乃至三代，天地观对于古人的社会生活和行为，有着莫大的影响。比如，成书于西周初年的《周易》就是古人取法天地的哲学作品。“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④⑨}周人认为“法象莫大乎天地”。^{④⑩}甚至认为“君子之德”也必须取则天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④⑪}

可见原始时代流行的“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古文化中十分流行。其影响所及，至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周人主张“君子之德”，必须效法天地；君臣之位要效法天道地道之圆方；甚至都城宫室建筑也要效法天地之象。^{④⑫}至今人们把每页书的上下方，还称为天地。当然，由于古代这种文化传统去今已远，所以很难被今人所了解。因此有些研究者很难从理性上接受方孔钱起源于古人天地观念的解释。对此，王献唐又有很好的补证，即以汉制反推先秦。汉武帝时白金三品的设计思想，据记载便是“为圆形像天，为方形像地”。由此可见秦汉人的思维与行事。

上述思想，看来已是东周时各地区普遍流行的观念。从秦、齐乃至楚地，都具备形成方孔圆钱的观念文化基础。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不宜把方孔货币限定为某地所原创。事实上，至战国末期，列国范围内均可能出现货币圆钱化的趋势。

齐地圆钱系列中，是否经过圆孔阶段？就著录和出土资料来说，郑家相曾论及据说是齐地乃至皖北出土的且阳四朱、即墨四朱圆孔圆钱，^{④⑬}从重量单位看属秦制，故该币身份可疑。而且 50 年代以来，科学考古发掘中，从未再发现。目前对这一类货币，似宜存而不论。齐地的文化环境，亦具备了原创方孔圆钱的条件，齐地有以珠玉为币的历史传统，又是古代文化思想活跃地区，燕齐之地在战国时代，一度成为文化中心，各种思潮和思想家多在这里产生。著名的稷下学派中，有不少思想家，在天地宇宙观方面都有所建树，如阴阳五行家邹衍即以长于天论而闻名，号称“谈天衍”^{④⑭}。

战国时期，各地区出现的圆钱的钱文，有较大差异，分别有记地名、记重量或兼记地名和重量数种，形制工艺上亦有无郭、有郭及铸法的不同。这些差异，其实正反映了各地刀币区、布币区和圆钱区分别演变的文化差异。如：布币区出现的圆钱，就自然沿袭了铸纪地名的传统。刀币区的圆钱就保留了标重传统，如臚六化，臚四化等。以往研究者往往出于思维定势，把秦地以外发现的圆钱说成是秦占领区所铸币，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为既然秦军已吞并该地，按照秦国在兼并战争中的铁腕政策推断，就只能铸行秦半两，绝

不至于再搞充满妥协色彩的记地名，或记布币新重量单位的圜钱。

圆形方孔钱在工艺上和日常使用上，也同样比圆孔有先进之处。就工艺而论，随着铸钱工艺的进步，在以铜范浇铸出边沿不齐的钱坯后，方孔形态便于“以竹木条直贯数百文受锉”，来加工铜币外廓。^⑤就勒铭而言，方孔便于上下左右顺序排列，钱文也利于判读；方孔又便于以绳索穿之，易于携带，因此形成后代的“贯”制。就美学效果而言，开出方孔以方圆几何图形相匹配的观赏美感，也胜过圆形圆孔。因此，中国铜铸币历经演变，先是形成圆形环钱，第二步便定位在方孔圜钱形制上。这是人类货币进化共同规律和中国文化独特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方孔圜钱成为通宝货币形制的历史渊源。

第三节 先秦货币思想精华和政策实践

三代处于货币文化起源阶段，货币思想和政策因历史资料有限，难以详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典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涨阶段，形成了足以反映这一时期特征的货币思想和货币政策，为中国传统货币理论和传统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渐被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所取代，社会经济形态步入一个新阶段。战国时期生产力有新的飞跃，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构成古代工商业发展的第一次高峰，从而为货币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一时期由于西周初步的统一局面瓦解，出现诸侯列国崛起的割据局面，各国争雄称霸引起了连绵不绝的战争。政治和军事上的分裂，促成货币制度和货币形态的分化。战国后期新的统一趋势，又促成各地货币的初步趋同。

基于探索、总结复杂的货币现象，以发展经济实力，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的需要，并且也获益于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先秦货币理论在此阶段随之奠基。其中有些理论付诸了实践，有些则带有更多的幻想色彩。由于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有限，因此货币思想和理论带有鲜明的本土性和强烈的独创性。这一时期重要的货币思想有：

一、东周子母相权论

春秋末年，东周王室卿士单旗在周景王二十一年，提出子母相权论，^⑥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理论。单旗的议论，从政策论层面看，首先是主张根据市场流通的需要，铸轻币或重币，轻币为子，重币为母，两者相权而行，重量要足值。其次，认为货币的基本作用是“权轻重”，即发挥价值尺度职能，铸币重量要适度，不至于“民患轻”或“不堪重”，以便平抑物价，稳定币值，使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相适应。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记载较为简略，除上述两方面大致含义外，其子母的概念与轻币重币、大钱小钱之间的关系，以及“王废轻而作重”就会“民失其资”之间的因果关系，在阐述上都不够明确，这反映了早期货币思想的局限性。

就原理论层面分析，其言论中实际已涉及到金属论观念，认为金属货币的价值在于本

身所含金属量，所以货币必须有足值的金属量。已触及到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首要职能。又指出不足值的大钱会导致民失其资。还肯定了实行同一种金属铸币的主辅币制度，以及货币铸造是王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以来，子母相权论经常为后人所阐述和引用，并随着币制的发展而增益改变其内容。唐宋以后，有人用来说明足值与不足值货币的关系，如大小钱相权问题。有人用来说明纸币与铜币相权；或用来说明金银、铜币与纸币相权等问题。总之，对我国古代货币思想和制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管子的货币论

齐国发达的商品经济土壤，孕育了先秦货币思想的奇葩——《管子》。《管子》的货币思想涉及到货币起源、货币本质和职能、货币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之作用等一系列命题。

首先，《管子》作为名目论者，尤其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认为“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⑦通货一词，被后世沿用至今。而书中关于“刀布，沟渎也”^⑧的叙述，把货币流通特色揭示出来。

其次，把经济上的轻重论应用在货币与商品关系方面，提出了货币数量说的有关思想，认为商品价值、货币购买力是由货币数量决定的，即“币重则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⑨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增减，就会使商品价格发生正比例的变化。此说以后长期被湮没，至唐宋钱荒刺激下，一度复兴，并影响到当时的货币政策。

其三，阐发了国家运用货币干预经济的思想，主张国家“执其通施（货币）以御其司命”（粮食），^⑩其运作手段则是通过运用货币和价格政策来实现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并且区分国内经济周转与对外贸易来灵活运用。其经济思想带有明显的经济干涉主义倾向，主张国家经营乃至垄断某些经济事业，以达到充实国家财力的目的。凡此种种，均达到古代货币思想的高峰，为汉唐以后封建货币政策模式，构筑了理论基础。通宝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多祖述《管子》，将货币作为封建王朝的财政工具，进行论证和政策设计。

先秦货币思想还论及商品的价格问题。如子贡的物以稀为贵论，范蠡、李悝的平粜论，墨家、孟子的价值、价格观点等。总之，先秦货币思想在当时的世界上，与希腊、罗马的货币思想遥遥并峙，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所创立的子母相权、轻重等中国特有的经济范畴，建构了传统的货币认识格局。

三、铸币权的分散与统一

从制度和政策实践等层面看先秦货币文化遗产，也有足以影响通宝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中关键是铸币权的问题。我国古代殷商铸币权问题已不可详考。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都可以铸造发行货币，反映了封建割据形势下，铸币权分散的历史特点。诸侯国内的君王甚至卿大夫也享有铸币权。以晋国为例，晋阳本是晋卿赵氏的封邑，就铸有战国初期的布币，也可能铸造过空首布；平阳曾是战国时赵国平阳君的采邑、考古亦发现平阳铸造

的布币。洛阳曾发现战国末期的文信圉钱。^{⑤1}尽管文献中找不到有关的线索，但传世古钱和考古发现已经肯定地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的铸币权是分散的。

秦自商鞅变法后，为实行中央集权，开始把货币铸造作为王权象征收归国有。在齐国也有铸币权统一于国君的迹象。^{⑤2}这个事实在制度上得到肯定，所以周显王三十三年（前 336 年）秦惠王施行货币王室专铸时，周王反倒去“贺行钱”了。^{⑤3}

《史记·循吏传》记楚庄王拟行大钱，“为币轻，更以小为大”，引起市场的混乱，后有楚令尹孙叔敖谏止，才恢复原制。就楚之爱金、郢爱、陈爱看，均是以楚国都城为铭记，这意味着楚国的铸币权是集中在君主手中的。

考古发现的《云梦秦简》表明，秦国在统一铸币权的同时，还采取了立法形式，对民间私铸加以禁止。^{⑤4}铸币权的集中，是先秦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势和历史的必然。这个传统，被通宝币制所继承。

第四节 半两币制的历史遗产

一、半两币制的两大阶段

严格意义的半两币制，是指秦统一后，由国家确立并通行全国的半两货币制度。它在历史上行用了 104 年（从前 221 年至汉武帝元狩四年）。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种由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以立法形式推行的钱币制度，意义和作用无疑是重大的。

半两币制来源于战国时代的秦国。其始铸年代，综合各种线索，大致在秦孝公变法之年（前 359 年）。由此至惠文王二年，为初创阶段；此后至秦灭六国，为定型阶段。若把秦统一中国之前的这两个阶段计算在内，则半两钱行用共达 240 年之久。当然，统一前的秦半两，只是战国多元化币制的一种，属于区域性货币，流通范围只限于秦国领土之内。

二、西汉前期半两币制的沿革

半两币制的沿革，入汉以后较为频繁。刘邦建汉以后，为了改善经济凋敝的状况，借口秦半两钱过重不便使用，放民铸钱，结果，半两随趋轻小，出现类似榆荚的小钱。^{⑤5}高后二年，改由国家垄断铸币，另铸八铢半两^{⑤6}；六年改铸五分钱的四铢半两。^{⑤7}文帝即位后，取消盗铸钱令，再度开放铸币权，官民并铸。朝廷则铸行四铢半两。^{⑤8}持续到景帝中元六年（前 144 年），又禁民铸钱。^{⑤9}武帝时一度停铸四铢半两，改铸三铢。这是第一次改变“半两”这一币制的品类名称。建元五年（前 145 年），恢复了文帝四铢半两，^{⑥0}即传世的有廓四铢半两钱。^{⑥1}持续到元狩四年（前 119 年）又废半两，更铸三铢，次年令郡国铸造五铢^{⑥2}。延续两个多世纪的半两币制，于元狩四年寿终正寝。

三、秦汉半两钱铸造权的变迁及教训

秦半两币制，是秦王朝取缔六国多元货币制度，实施货币统一的历史产物。秦兼并天

下后，针对六国币制各行其是的纷乱状况，颁布了货币改革令：“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秦半两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②同时废止东方原六国所铸的旧币。

从现有资料和文物线索分析，秦推行统一的半两币制，包括了货币形态的统一，货币单位的统一，铸造权的统一和发行调控政策的统一。至秦二世时，继续大力推行货币统一；“复行钱”，^③反映了秦王朝对统一货币制度的高度重视。秦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权力为后盾，以法令形式为手段，推行统一币制。这种做法，为通宝货币制度所继承。通宝时代的各个皇朝，对此传统皆奉行不渝。维护币制的统一，对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入汉以后，刘邦及其后继者开放铸币权，对秦朝统一的货币制度进行了变革尝试。经过约半个世纪的“放民铸币”的政策实践，固然促进了西汉商品经济的飞跃发展，改善了流通货币量不足的经济症结，但开放铸币权的弊端也十分严重。西汉前期社会货币经济的无序发展，造成货币权力与封建统治权力争衡和冲突。^④因此汉景帝终于恢复了禁民铸钱的法令。

西汉前期的半两币制，与秦半两的不同处在于，除了中央铸造外，郡县和封国始终有铸币权，即便颁布禁民间铸钱令以后，郡县封国铸币仍是合法的。武帝元狩五年，令郡国铸五铢，^⑤就说明了这一点。

半两币制的制度和政策实践，主要集中在铸币权的收放问题上。从正反两方面验证了王朝政府专铸铜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西汉前期的中央与郡国共铸半两的制度，既是承袭了春秋战国的历史传统，又开启了后世通宝币制的铸造体制。因为仅仅靠中央垄断铸造，在古代生产工艺和运输条件局限的情况下，是不经济的。故尔历代通宝皆是在产铜地区，或地方政区中心设炉铸行的，这与半两币制有相通之处。

第五节 五铢币制的形成与兴衰

西汉中叶，武帝于元狩五年（前 118 年）创立五铢钱制。五铢币制运行至唐武德四年（621 年）凡 739 年，形成我国货币史上一个五铢币制时期。

武帝五铢，初为郡国并铸，至元鼎四年（前 113 年）专令上林三官铸造标准五铢。王莽篡汉后，推行复古改制，五铢钱被废置。东汉复行五铢。三国鼎立之时，曹魏地区基本流通五铢，吴蜀两国铸行大钱，其中蜀地仍为直百五铢，保持了五铢之名；吴地则仿王莽币名。至两晋南北朝时，南朝钱帛并用，钱法甚乱，前后铸行钱币近 20 种，其文以五铢为钱名的不足 10 种，主要的有萧齐五铢，陈五铢两种。

北朝币制与南朝稍异。北魏孝文帝之前多为实物经济，自孝文铸五铢以来，历朝所铸多为五铢。但前面多冠以年号。至北周有五行大布等三种钱币，不再用五铢为名。

隋统一后，整顿货币积弊，力挽五铢币制衰颓趋势，重铸仿汉代的五铢钱，禁用旧

钱。隋五铢钱一直沿用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

五铢币制在西汉中叶正式创立，不是偶然的。从五铢币的造型、制度的形成来看，它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并且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

一、五铢币重的意义

半两币制的币重，经历了一个由重到轻的发展历程。从早期半两看，确实是重如其文的。秦制一斤，约等于今 250 克，故一铢约合今 0.7 或 0.8 克。半两则合今 8 克。根据学者对青川秦半两和陕西张堡窖藏秦半两的测定，早期半两大体合乎上述币重。但秦半两中，已有相当一部分轻于半两之重。^⑦

至西汉，榆荚半两仅重一克，甚至不足一克。官方铸行的八铢半两、四铢半两，其币重均远远低于半两的真实标重。^⑧因此，西汉前期对方孔圆钱的合理币重，进行了长期探索。

汉武帝即位后，曾铸三分钱、即四铢币，^⑨又两度行三铢币，最后才将币重定位在五铢上。按一铢约等于 0.7 克，五铢约相当于今 3.5 克。从中外古代钱币的重量看，3.5 克是一个标准重量，因此成为五铢币制的一个基本要素被固定下来。^⑩

二、币式的改进

早期半两币制的币式，较为粗糙，皆为毛边，方孔与周边皆无廓。这不仅影响美观，给携带使用带来不便，而且也易被私铸者磨铍取铜。

从方孔圆钱的创制看，先秦齐地的臚化钱和燕地的一化币式较为先进，方好皆有廓。^⑪但这种币式未被秦统一货币时吸收借鉴，所以未能构成半两币制的发展环节。

从汉高祖荚钱始，到文景半两钱止，各种西汉半两，仍为平背无廓方孔圆钱币式。武帝建元元年初铸三铢，亦是此式。至建元五年“行半两钱”时，新铸一种平背面上带有外廓的半两钱。

至元狩五年，摒弃半两币制，正式推出五铢币制。其币式为“周廓其下”，即面背皆有廓的方孔圆钱。元狩六年，又“令京师铸官赤仄”。赤仄即赤侧，即铸币边缘一律进行锉平加工，币制的生产工艺进一步改善。^⑫

元鼎四年，行上林三官五铢，就完全定型在赤侧五铢币式。再者又有穿孔面幕铸廓的币式，细分包括面穿上下左右均有廓，或仅面穿上有廓，三面无廓的，以及背穿有廓、无廓的。在这些币式上，五铢币尚未统一。

三、币径的统一

币径即方孔圆钱的直径和孔径的尺寸。半两币制在币径的造型上个体间存在较大差异。据对陕西凤翔高家河出土的一批半两钱测量，钱的直径尺寸，从 3.2cm 至 1.15cm 不等。孔径则从 1.3cm 至 0.6cm 不等。直径误差达 2.05cm，孔径误差达 0.7cm。汉代八铢八两直径亦在 2.8—3.2cm 之间（如成都北郊西汉墓，北郊洪家包西汉墓出土的八铢八两）。